象越来越多地被创作者融入电影情节中，翻译以及译者的地位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传达了信息与观念，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世界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相对较为年轻的传播媒介中，翻译现象无处不在，有的影片反映了翻译行为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者所承受的压力，有的反映了语言以及文化的差异引发的喜剧效果，也有的影片则直接以译者为对象来阐述影片主题。而无论是将译者作为影片主要角色，还是在影片中借助角色的翻译行为来体现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心态的差异，文化冲突中的译者形象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向观众展示出不同文化的强弱地位、语言的可译性与情感的不可译性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伦理因素等。

2. *译者形象在新闻传播中的呈现*。新闻翻译既是语言翻译，也是信息传播。要从事新闻翻译，译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素养，包括高深的政治水平、扎实的语言功底、广博的文化知识等。在翻译功能理论的影响下，译者的角色是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要求，明确翻译目的，然后确定翻译方法，最终生产出译文。在功能目的论的指导之下，原文不再是译者进行翻译的唯一依据，而只是译者所能利用的信息的一部分，据此，译者可以选择有利于实现翻译要求和目的的内容，然后采用便于实现目的的表现方式来生成译文文本。译者理解原文并生成译文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客观辩证统一的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对原文作者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不断“再创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编译者具有更多的主观能动性，而由于新闻传播的特殊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译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

作为对外宣传的方式之一，新闻翻译对译者提出了严格的立场要求，译者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新闻内容，还要具备辩证思维能力。要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新词语译成英语，就必须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基本的了解，译者的知识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的质量和水平，这里所说的知识面囊括了译者基于其阅读和阅历的广博的知识面，体现了其作为复合型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社会化角色

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间人，在将源语向目的语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先把握原文中的思想情感以及审美意境等艺术因素，然后转化成目的语读者可接受的艺术形式，译者的主体性，即主观能动性，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对于译者而言，译者主体性分为译者在译内和译外所发挥的主体作用，译者越是能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就越能胜任翻译工作，但与此同时，如若过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译者很可能会“越界”，从而操控原文，而最终将自己的“译者身份”变为“创造者身份”，这就是译者社会性的体现。说到译者的社会性，就不得不提及译者的角色化现象。

周领顺指出，译者的角色化，是译者为了使译文满足某种需要而调整或者改变自己行为角色的社会性选择过程，是译者社会性及其行为社会化的反映。作为一个社会人，译者在翻译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多角色特征，而译者在其角色行为下的译文则是角色化译文。在这里，我们以新闻传播为例来探析译者的角色化行为。

在进行编译活动的过程中，新闻译者不只是担当译者的角色，他的另一个角色即社会人角色也在影响着他的翻译活动，而译者的社会化程度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读者的需求，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操控，新闻编译者要考虑到本国政治、历史、文化等各种翻译外因素。作为集译者和编辑身份于一身的新闻编译者来说，译者的身份与编辑的身份孰高孰低，决定了译者的语言性还是社会性占上风，而新闻编译者的社会性就是译者的角色化过程。例如，关于海峡两岸的统一，我们按字面意思很容易想到使用“unification”一词，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实现和平统一其实就是完成台湾回归祖国的目标，因此，译者将其处理为“peaceful reunification”，既突出了政治立场，又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对外宣传的传播效果大大增强。同时，对于国外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或者偏见性报道，新闻编译者绝对不可以直接引用，而要在引用的基础上摆明我方的立场；对于披着客观外衣的主观推测，新闻编译者往往可以选择忽略不译。

译者的主体性在译内和译外的延伸会引发翻译研究者对于译者社会性的关注，并以“译者角色化行为”作为命题，探究作为社会人的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超越语言性以操控原文，并最终超脱译者身份，承担着“非译”之事。译者位于两种文化的交汇点，作为两种文化的传播者和中间人，要时刻提醒自己，自由有度，主观能动性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①【爱尔兰】迈克尔·克罗宁：《电影中的翻译》[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

②屠国元 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 年第 6 期

③袁莉：《文学翻译主体的诠释学研究构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④查明建 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 年第 1 期

⑤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

⑥周兆祥：《翻译与人生》[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 许玉婷 詹 琰

争议性科学事件巨型对撞机的媒体报道分析

2015 年 12 月 24 日，丘成桐在“赛先生”发表了《我为什么期望中国建设巨型对撞机：宇宙奥秘》，引起了科学界的激烈争议。由此，中国是否应建巨型对撞机的科学话题（the CEPC—SPPC Plan）①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随着转基因事件、PX（对二甲苯）事件、核能事件等引起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争议性科学事件的媒体报道也呈现了新特点、新情况。

所谓争议性科学事件，是指目前科学界对某一科学事件持不同声音和观点，引起各方争议，未能达成共识的科学事件，且事件本身具有影响大、涉及层面多、投入大等特征。②本文围绕中国是否建造巨型对撞机事件（*以下简称“巨型对撞机事件”*）相关报道，力图揭示我国争议性科学事件媒体报道特点、科学意见领袖与媒体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媒体自身立场与争议性科学事件观点表达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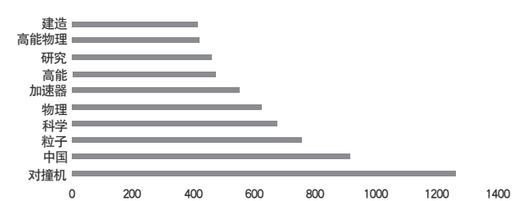
科学意见领袖成为争议性科学事件新闻报道动力

本研究以“巨型对撞机”为关键词，选取了 2015 年 12 月到 2017 年 4 月的媒体报道，共计超过 250，000 余字，经过人工剔除不相关的文本后，获得了 55 篇有效文本。③通过词频统计发现：巨型对撞机事件的新闻报道在内容上主要集中在粒子物理领域，专业性明显；在媒体报道频次上，呈总体平缓、局部激烈、周期跨度长等特点。然而，隐藏在上述特征背后的是科学意见领袖成为争议性科学事件媒体报道的动力。

1. *核心词频分析：报道内容专业性明显*

研究中，采取了 ROST NewsAnalysis Tools 进行主题与关键词统计，对该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发现高词频前十排名分布如图 1。其中，对撞机、中国、粒子、科学、物理居前五，可见该文本主要围绕巨型对撞机事件进行相关报道，涉及领域主要为粒子物理。此外，文本分析发现该事件的讨论涉及国际主要对撞机机构，国际化背景明显，且国内外科学家相关群体态度分布一致，支持方占主导地位。其中，SSC④（*美国超级超导对撞机*）因资金不足被取消，对巨型对撞机事件也颇具影响。

图 1：中国巨型对撞机事件新闻报道排名前 10 高频词分析（2015 年 12 月 –2017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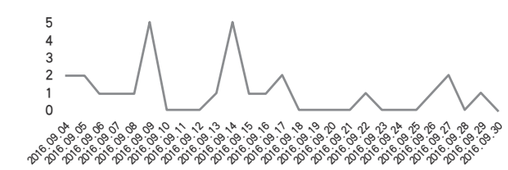


2. *意见领袖：科学大腕成为争议性科学事件媒体报道的动力*

选取自 2015 年 12 月到 2017 年 4 月的相关媒体报道为分析对象，发现媒体报道总体趋势较为平缓，2016 年 9 月达到顶峰，随后逐渐平缓，兼具局部小高峰与小低谷交替的特点。

2016 年 3 月丘成桐出版新书《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成为巨型对撞机事件论战开端。2016 年 9 月 4 日，杨振宁在“知识分子”上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同日，王贻芳在“赛先生”发表《中国今天也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双方论战激烈。9 月 6 日，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孟源发表《回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攻克什么技术》；9 月 7 日，丘成桐回应王孟源的提问，于“中科院高能所”发表了《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9 月 8 日，徐庆金在“知识分子”上发表《大科学工程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9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时评”《期待更多科学“对撞”》，超大对撞机的讨论进一步走入科学家相关群体及部分公众的视野。

图 2：巨型对撞机事件媒体报道频次 – 时间（2016 年 9 月）分布



在 2016 年 9 月份，媒体对巨型对撞机事件的报道频次尤多，呈现周期性、小高峰与小低谷交替进行的频次分布，每天报道频次最高为 5 次，最低为 0 次。在 55 篇媒体报道中，2016 年 9 月份媒体报道篇数高达 28 篇，占总报道篇数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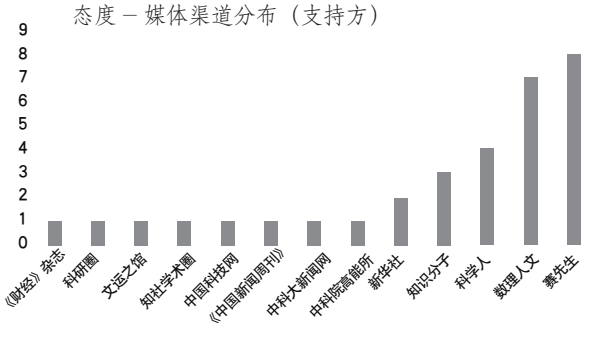
据观察，巨型对撞机事件的争论中，以杨振宁为首的反对派最先发出声音，随后以王贻芳、丘成桐、何祚庥为代表的支持方进行论战，他们以媒体报道为载体，积极发声推动媒体对此持续关注。媒体通过展现其意见而影响受众的观点，正反方的激烈碰撞成为推动媒体报道的动力，这些引发并助推舆论的著名科学家成为了意见领袖⑤，促成了科学意见领袖推动争议性科学事件媒体报道的局面。

媒体在争议性科学事件中对选择何种观点进行报道具有倾向性

根据把关人理论，任何被发表的言论都经过把关人⑥的把关，对言论进行一定的选择、剔除、编辑与加工才最终呈现在公众面前。为揭示媒体观点表达与媒体渠道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55篇新闻的发布媒体，对巨型对撞机事件的不同观点（支持、反对、中立）进行分类和统计，探讨媒体在争议性科学事件中选择何种观点进行报道是否具有倾向性。

1. 支持方媒体渠道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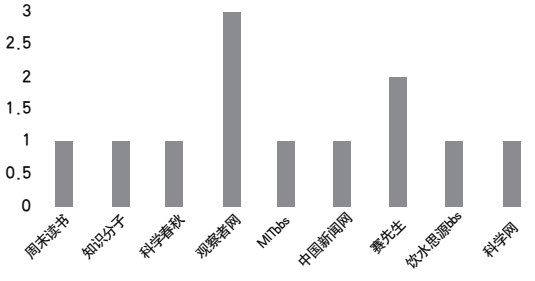
图3：巨型对撞机事件科学家相关群体态度－媒体渠道分布（支持方）



通过对巨型对撞机支持方的媒体发布渠道进行分析，发现发布支持方观点的媒体渠道多达13家。其中，“赛先生”处于优势领先地位，其次是“数理人文”，“科学人”紧随其后；而其他媒体诸如“中科院高能所”“知社学术圈”、《中国新闻周刊》、中新网、“科研圈”等分布相对均等。

2. 反对方媒体渠道分析

图4：巨型对撞机事件科学家相关群体态度－媒体渠道分布（反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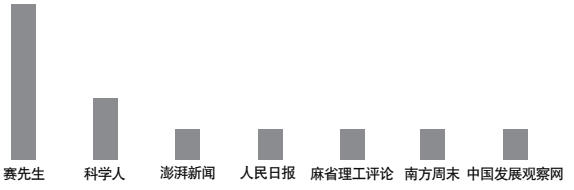


通过对巨型对撞机反对方主要媒体发布渠道分布进行分析，发现发布反对方观点的媒体渠道9家。其中，观察者网、“赛先生”处于主要地位，“知识分子”“周末读书”、中国新闻网等分布相对均等。

3. 中立方媒体渠道分析

对巨型对撞机中立方主要媒体发布渠道进行分析，发现发布中立方观点的媒体渠道7家。其中，“赛先生”“科学人”处于主要地位，而澎湃新闻、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国发展观察网报道频次仅1条，属于重大事件主流媒体不失声的状态。

图5：巨型对撞机事件科学家相关群体态度－媒体渠道分布（中立方）



总体而言，从55篇媒体报道的频次看，支持方观点占比58.18%，占主导地位，反对方占比20%，中立方占比21.82%。对图3、图4、图5交叉分析，发现同时发布三方观点的媒体仅有“赛先生”。这与“赛先生”作为综合实力强劲的科学传播媒体密切相关。除“赛先生”之外，同时报道支持方与反对方观点的媒体仅“知识分子”；同时发布支持方观点和中立方观点的媒体仅“科学人”；同时发布反方观点和中立方观点的媒体不存在。

观察发现，发布三方观点的媒体几乎不重合（同时发布支持方与反对方观点的媒体报道仅1篇，相对于55篇报道而言属于小概率事件，可忽略不计），因此笔者认为媒体对选择何种观点进行报道具有倾向性。

争议性科学事件的观点表达是否受到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有待研究

尽管媒体对选择何种观点进行报道具有倾向性，但一方面本文总样本量偏低，收录新闻报道难以穷尽，另一方面多数媒体的报道篇数仅1篇，代表性较低。因此，争议性科学事件的观点表达是否受到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美】丘成桐 史蒂夫·纳迪斯著，鲜于中之 何红建译：《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中国探索宇宙最深层奥秘的前景》[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4月版

②马萍 吴佩：《试论争议性科学议题报道的基本要求——以问题疫苗事件为例》[J]，《中国报业》，2016年第8期

③【日】Yui Arakawa，Ryosuke Yoshimoto，Fuyuki Yoshikane，Takafumi Suzuki，Analyzing the Content and Text of Tweets by Japanese Academic Researchers[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2015（1）：2

④董丽丽 刘兵：《1986—1993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中关于SSC的争论》[J]，《科技导报》，2007年第6期

⑤费军 王露：《基于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力评估的网络治理研究》[J]，《电子政务》，2016年第7期

⑥刘利永 徐占品：《“把关人”视阈中的地方官媒突发事件报道研究——以天津卫视“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报道为例》[J]，《新闻知识》，2016年第9期

（许玉婷：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詹琰：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